

英
语
语
言
文
学
博
士
论
丛

美国文学中的生态思想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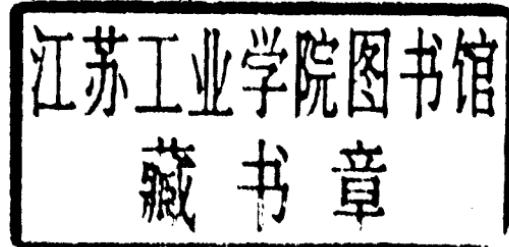
朱新福 著

苏州大学出版社

英语语言文学博士论丛

美国文学中的生态思想研究

朱新福 著



苏州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国文学中的生态思想研究/朱新福著. —苏州: 苏州大学出版社, 2006. 11
(英语语言文学博士论丛)
ISBN 7-81090-613-5

I. 美… II. 朱… III. 文学研究—美国—英文
IV. I71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33778 号

美国文学中的生态思想研究

朱新福 著

责任编辑 王英志

苏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苏州市干将东路 200 号 邮编: 215021)

丹阳市教育印刷厂印装

(地址: 丹阳市西门外 邮编: 212300)

开本 850mm×1168mm 1/32 印张 30.625(共四册) 字数 765 千
2006 年 1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1090-613-5/I·22 定价: 90.00 元
(共四册)

苏州大学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本社负责调换
苏州大学出版社营销部 电话: 0512-67258835

目 录

引 言 美国生态文学批评述略	(1)
第一节 美国生态文学批评的历史渊源	(3)
第二节 美国生态文学批评的哲学、文化思想基础	(7)
第三节 美国生态文学批评的文学基础：自然写作与荒野描写	(35)
第四节 美国生态文学批评的理论基础及其发展的三个阶段	(42)
第五节 生态文学批评面临的问题	(50)
第一章 美国殖民地时期文学作品中生态描写的目 意义	(56)
第一节 早期的荒野描写及其宗教意义	(56)
第二节 早期的生态描写与新大陆的形象	(59)
第三节 生态描写与清教神学思想和美国国家意识的构建	(64)
第二章 美国浪漫主义时期代表作家/作品生态思想述略	(71)
第一节 爱默生的《论自然》——体现生态精神的文本	(79)

第二节	梭罗的《瓦尔登湖》——生态批评运动之前的生态文本	(90)
第三节	重读惠特曼——惠特曼的生态诗学思想一瞥	(102)
第四节	从巴特姆到缪尔——19世纪北美自然作家的生态保护意识	(118)
第三章	美国现代时期代表作家/作品生态思想研究	(126)
第一节	海明威生态思想一瞥	(128)
第二节	福克纳作品中的生态思想初探	(136)
第四章	美国后现代代表作家/作品生态思想研究	(147)
第一节	从《林中之雨》看美国当代诗人 W. S. 默温 的生态诗学思想	(149)
第二节	加里·斯奈德的生态思想基础	(163)
第三节	唐·德里罗和《白噪音》中的生态意识	(181)
第五章	美国生态女权主义批评和美国女性作家生态思想 研究	(192)
第一节	美国生态女权主义批评述略	(193)
第二节	自然·性别·社会——玛丽·威尔金斯·弗 里曼的生态小说	(205)
第三节	寂静的春天里的一棵榆树 ——蕾切尔·卡森与西尔维娅·普拉斯的 生态作品研究	(213)

第四节 自然、文化与精神生态 ——从生态文学批评视角看托尼·莫里森 的作品	(234)
结语：美国生态文学研究的意义	(255)
参考文献	(270)

引言 美国生态文学批评述略

大自然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有着它自己运动演化的方向，自然万物之间存在着普遍的相对的关系。从日月星辰、风雨雷电到山川河流、森林土地，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有生之物——动物、植物和微生物，都是这个整体中合理存在的一部分，都拥有自己的价值和意义，都拥有自身存在的权利。它们只服从那个统一的宇宙精神。

人类目前面临的和即将面临的巨大的生态灾难，是近2000年来，尤其是近300年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完全是人类自己一手造成的。当代人必须对此作出深刻的反思……这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或科学管理问题，更是一个伦理问题、哲学问题、信仰问题，甚至是一个诗学的、美学的问题。

生态文学批评又是一种更看重文学艺术内涵的文艺批评，其中包括文学艺术的社会内涵、文化内涵、地域内涵、种族内涵、性别内涵、人性内涵、生命内涵、自然内涵和精神内涵。^[1]

[1] 鲁枢元. 生态文艺学.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0. 386 ~ 387.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始于美国的生态文学批评(Ecocriticism)是在全球环境危机日趋严重的情况下产生的。生态文学批评的定义是什么？美国生态文学批评的主要倡导者和发起人彻丽尔·格罗费尔蒂(Cheryll Glotfelty)指出，生态文学批评旨在探讨文学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如果说女权主义批评是从性意识(gender-conscious)角度考察语言与文学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批评是把生产、经济、阶级的意识纳入文本阅读，那么，生态文学批评则是把以地球为中心的思想意识运用到文学研究中，探讨文学与自然环境之关系的批评。^[1]美国另一位生态批评学者劳伦斯·布伊尔(Lawrence Buell)认为，生态批评通常是在一种环境运动实践精神下开展的；生态批评家不仅把自己看做从事学术活动的人，而且还深切关注当今的环境危机，参与各种环境改良运动，认为文学和文化研究可以为理解及挽救环境危机作出贡献。布伊尔认为，生态批评是跨学科的，它从科学、人文地理、发展心理学、社会人类学、哲学(伦理学、认识论、现象学)、史学、宗教以及性别、种族研究中汲取阐释模型。生态批评理论不可能总结出某种单一的模式。随着该生态批评运动的壮大，“生态批评”这一术语的含义也越来越复杂。布伊尔指出，目前生态批评是以如下前提为出发点的：首先，所有形式的话语在原则上都可以充分地成为“环境”的符号，而不仅仅是关注非人类世界及其与人类关系的体裁；其次，“环境危机”并非只是一种威胁土地或非人类生命形式的事情，而是一种全面的文明世界的现象(以各种形式包括了全球所有国家)，不仅关乎相对较少的人类可体验到的与自然的接触，也关乎日常的人类经验行为；生态批评的任务不只在于鼓

[1] Cheryll Glotfelty & Harold Fromm, ed. *The Ecocriticism Reader: Landmarks in Literary Ecology*, Athens: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96, p. 18.

励读者重新去与自然“接触”，而且要灌输人类存在的“环境性”(environmentality)意识，即作为一个物种的人只是他们所栖居的生物圈的一部分，并使这一事实在所有思维活动中留下印记^[1]。生态文学批评以对人与自然的联系的关注使批评家进一步突破文本的社会历史语境，站在地球生物圈的高度上考察传统文学经典的构成、现存文学理论的得失，从而能够再现缺席已久的自然在文本乃至文化中的地位。

本章将首先在简述美国生态文学批评的历史渊源的基础上，探讨美国生态文学的哲学基础、文化思想基础和文学基础，然后在阐述其理论基础及发展的三个阶段基础上，探讨美国生态文学批评旨在解决的主要问题。

第一节 美国生态文学批评的历史渊源

生态文学批评这一概念的提出，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70 年代。1972 年，约瑟夫·米克 (Joseph W. Meeker) 在《生存的喜剧：文学生态学研究》(*The Comedy of Survival: Studies in Literary Ecology*, 1972) 中提出“文学生态学”这一概念，“对出现在文学作品中的生物主题进行研究”^[2]。1978 年，威廉·鲁克特 (William Rueckert) 在其论文“文学与生态学：生态批评的实验”(*Literature and Ecology: An Experiment in Ecocriticism*) 中首先使用了 ecocriticism 这一批评术语，提出“把生态学以及和生态学有关的概念运用到文学

[1] 参见韦清琦. 打开中美生态批评的对话窗口——访劳伦斯·布伊尔. 文艺研究, 2004(1): 64 页.

[2] Joseph W. Meeker, *The Comedy of Survival: Studies in Literary Ecology*, New York: Scribner's, 1972, p. 9.

研究中去”^[1]。随后,有人提出“生态诗学”(ecopoetics)、“环境文学批评”(environmental literary criticism)、“绿色研究”(green studies),或“绿色文化研究”(green cultural studies)等其他术语,但大多数人倾向用 ecocriticism 这一提法,因为它不仅很容易被转变成 ecocritical 和 ecocritic 等形式,而且“eco”这一前缀强调人类社会与自然世界的关系。1985 年,弗雷德利克·瓦格(Frederick Waage)编辑出版了《讲授环境文学:资料,方法和文献资源》(*Teaching Environmental Literature: Materials, Methods, Resources*, 1985)一书。该书收集了 19 位讲授生态环境文学课程的教师写的“课程简介”(Course Descriptions),“目的是要在文学领域促进人们对生态文学有更深的了解和认识”^[2]。1989 年,《美国自然文学创作通信》(*The American Nature Writing Newsletter*)的创办使有关学者能发表生态文学研究的短文、书评和课堂笔记等。随后,不少人文学科的学术刊物相继开辟了生态文学批评的增刊或专刊,其中有《印第安那州评论》、《俄亥俄州评论》等美国著名的学术刊物。同时,一些大学开始把生态文学列入课程,作为现当代文论的一部分,受到学生的普遍欢迎。在 1991 年美国“现代语言学会”(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上,哈罗德·费罗姆(Harold Fromm)发起并主持了名为“生态批评:文学研究的活力”(Ecocriticism: The Greening of Literary Studies)的学术讨论。1992 年,在“美国文学协会”专题报告会上,格伦·A·洛夫(Glen A. Love)主持了题为“美国自然作品创作:新环境,新方法”(American Nature Writing: New Contexts, New Approaches)的专题讨论。同年,“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ASLE: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1] William Rueckert, “Literature and Ecology: An Experiment in Ecocriticism,” *Iowa Review* 9.1 (Winter 1978), p. 71~86.

[2] Frederick O. Waage, ed., *Teaching Environmental Literature: Materials, Methods, Resources*, New York: 1985, p. 8.

and Environment)成立,该学会的宗旨是“促进人类和自然世界关系的文学思想与文学信息的交流”,“鼓励新的自然文学创作,推动传统的和创新的研究环境文学的学术方法以及跨学科的生态环境研究”^[1]。1993年,第一届全美生态批评研究会在科罗拉多州的福特科林斯(Fort-Collis)举行。与此同时,第一份正式的生态文学研究刊物《文学与环境跨学科研究》(ISLE: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Environment*)问世。该刊物的目的是“从生态环境角度为文学艺术的批评研究提供论坛,包括生态理论、环境保护主义、自然及对自然描述的思想、人/自然两分法及其他相关的理论思想”^[2]。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一些生态文学批评的专著相继出版。1996年,佐治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格罗费尔蒂和费罗姆主编的《生态批评读者:文学生态学的里程碑》(Ecocriticism Reader: *Landmarks in Literary Ecology*, 1996)。该书收集了26篇论文,分三个部分,分别讨论了生态学及生态文学理论、文学的生态批评和生态文学的批评。1999年,洛兰·安德森(Lorraine Anderson)和斯科特·斯洛维克主编的《文学与环境:自然与文化读本》(Literature and Environment: A Reader on Nature and Culture, 1999)收集了长短不一的文章100多篇,以小说、诗歌、散文、传记等不同体裁论述了人类与动物、人类与居住环境、政治与环境、经济与生态等众多主题。2000年,劳伦斯·库帕(Laurence Coupe)主编的《绿色研究读本:从浪漫主义到生态批评》(The Green Studies Reader: From

[1] Cheryll Glotfelty & Harold Fromm, ed. *The Ecocriticism Reader: Landmarks in Literary Ecology*, Athens: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96, p. 18.

[2] Cheryll Glotfelty & Harold Fromm, ed. *The Ecocriticism Reader: Landmarks in Literary Ecology*, Athens: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96, p. 18.

Romanticism to Ecocriticism, 2000), 从“绿色传统”、“绿色理论”和“绿色读物”三方面论述了生态文学批评的渊源与发展。值得强调的是, 1999 年至 2002 年出版的伦纳德·西格杰(Leonard D. Scigaj)的《持续的诗篇: 四位生态诗人》(*Sustainable Poetry: Four American Ecopoets, 1999*)、乔纳森·贝特(Jonathan Bate)的《大地之歌》(*The Song of the Earth, 2000*)、帕特里克·穆菲(Patrick Murphy)的《自然取向的文学研究之广阔领域》(*Farther Afield in the Study of Nature-Oriented Literature, 2000*)、戴维·梅泽尔(David Mazel)的《美国文学的环境主义》(*American Literary Environmentalism, 2000*)、劳伦斯·布伊尔的《为濒临危险的地球写作》(*Writing for an Endangered World: Literature, Culture, and Environment in the U. S., and Beyond, 2001*)以及唐奈·德莱斯(Donelle N. Dreese)的《生态批评: 环境文学与美国印第安文学中的自我与地域》(*Ecocriticism: Creating Self and Place in Environmental and American Indian Literatures, 2002*), 把生态文学批评理论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除了出版生态文学批评的专著以外, 近年来有关生态文学批评的会议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例如, 在“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的协助下, 2000 年 6 月在爱尔兰举行了议题为“环境的价值”的多学科国际学术研讨会。2002 年 3 月“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在英国召开研讨会, 讨论“生态批评的最新发展”。2002 年 9 月, 该学会的英国分会在利兹大学召开第三届年会, 会议主题是“创造、文化和环境”, 重点研讨生态批评、生态诗学和生态女权主义。“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第三届年会于 2003 年 6 月在波士顿大学召开。会议的主题是“海洋—城市—水池—园林”(“Sea-City-Pond-Garden”)。

第二节 美国生态文学批评的哲学、文化思想基础

美国生态文学批评的哲学基础源自当代西方主要环境哲学思想,包括动物权利论、生命中心论、生态中心论、生态女性主义、后现代环境哲学、神学环境哲学、社会生态学、生物区域论等。下面我们简要地介绍一下其主要代表人物和主要思想。

一、从动物解放运动到“生命中心论”

20世纪60年代,现代环境主义在欧美发达国家兴起。环境主义者向哲学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人在世界中处于何种地位?人是不是惟一的价值主体?非人类存在物是否具有对人类的工具价值以外的价值?如果有,这类价值的性质如何?人对自然的正当权利和必要义务是什么?等等。如今,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都被归于“环境伦理学”(Environmental Ethics)或“环境哲学”(Environmental Philosophy)的范畴之内。在环境伦理学界或环境哲学界,历来存在着两大派别思想,即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sm*)和非人类中心主义(*non-anthropocentrism*)。人类中心主义者认为,只有人才拥有道德价值,人对自然的义务是人与人之间义务的间接义务;非人类中心主义者认为,非人类存在物,如生命个体、物种、生态系统等,同样具有道德地位,人对它们负有直接的义务。

非人类中心主义按立论基点大致可分为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两个谱系。个体主义发轫于早期的动物解放运动(*animal liberation movement*)和动物权利论(*animal rights theory*),分别以辛格(Peter Singer)和雷根(Tom Regan)为代表,成就于泰勒(Paul W. Taylor)的“生命中心论”(*biocentrism*)。泰勒秉承史怀泽(施韦策)的“敬畏生命”观点,将道德关怀的对象扩展到整个生命界,构筑了以“尊重自然”为终极道德意念的伦理学体系。整体主义通

常是指生态中心论 (ecocentrism)，其思想渊源要追溯到利奥波德提出的大地伦理生态思想。克利考特 (J Baird Callicott) 的主观价值论和罗尔斯顿 (Holmes Rolston III) 的自然价值论从两个不同的立场为之提供证明，而奈斯 (Arne Naess) 等人提出的“深层生态学”(deep ecology) 则代表着非人类中心主义之整体主义思想的最高成就，并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生态文学批评的哲学基础。

扩展道德关怀的范围，这是生态哲学的基本精神。当人类把道德关怀的对象从人类扩展到人类之外的其他存在物时，动物就成了这一扩展运动的首批受益者。在近代西方，关于动物是否具有道德地位的哲学思考早就存在。笛卡尔认为，动物只是一架“自动机”，它感觉不到痛苦。哲学家边沁 (Jeremy Bentham) 是近代西方第一个自觉而又明确地把道德关怀运用到动物身上去的人。他在《道德与立法原理》(1789)一书中指出，一个行为的正确或错误取决于它所带来的快乐或痛苦的多少，动物能够感受苦乐；因此，在判断人的行为的正确或错误时，必须把动物的苦乐也考虑进去。早在 1837 年，达尔文就指出，动物是人类的同胞，所有有生命的存在物都有着某种普遍的亲缘或亲情关系。在《人类的起源》一书中，达尔文明确指出，人类是从动物进化而来的；人与高等哺乳动物在精神功能方面并无本质的区别。塞尔特 (H. S. Salt) 1892 年出版的《动物权利与社会进步》(*Animal Rights and Social Progress*) 进一步指出，动物和人类一样，也拥有天赋的生存权和自由权。与这一观点相对应的是，美国语言学家伊文斯 (E. P. Evans) 首次指出并批评了基督教的人类中心主义性质，认为人和其他动物一样，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是大自然的产物。另一位美国思想家摩尔 (J. H. Moore) 则认为，地球上所有的动物在生理上、精神上、道德上都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总之，在辛格和雷根之前，已经形成了动物保护伦理的基本理论。

辛格的“动物解放论”是在边沁的思想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辛格认为,具有“感觉能力”(sentience),即感觉痛苦和享受快乐的能力,是拥有利益的首要条件。如果没有感受能力的存在,就不拥有利益;动物是有感受能力的,故拥有利益,应该得到道德关心。辛格承认,人有别于动物,人较之动物拥有更大的利益。问题是,感觉痛苦的能力和痛苦的量决定着特定的道德要求。从这一原则立场出发,人类有义务从根本上改变对待这些动物的方式,放弃给它们带来严重痛苦的行为。其结果可以减少痛苦的总量。辛格说:

如果一个存在物能够感受苦乐,那么拒绝关心它的苦乐就没有道德上的合理性,不管一个存在物的本性如何,平等原则都要求我们把它的苦乐看得和其他存在物的苦乐同样(就目前所能做到的初步对比而言)重要。如果一个存在物不能感受痛苦,那么它就没有什么需要我们加以考虑的了。这就是为什么感觉能力(用这个词是为了简便地表述感受痛苦、体验愉快或幸福的能力,尽管不太准确)是关心其他生存物的利益的惟一可靠界线的原因。^[1]

从伦理学上看,动物解放运动的意义在于,它提出了一个实质性的“内在的好”(intrinsic good,又译“内在的善”)的概念(趋乐避苦),并指出我们的道德责任在于把痛苦总量减到最小。

动物权利论者雷根从康德的义务论出发,以权利为基础为动物辩护。雷根认为,我们认定每个人都有不受损害的道德权利,并不是由于人拥有利益,而是由于人拥有某种优先于利益和效用的价值,即“固有价值”(inherent value)。他进一步指出,一个存在物具有天赋价值的根据,不在于他禀具理性或者是道德代理人,而在乎他是“生命主体”(subject-of-a-life),也就是说,拥有固有价值的

[1] 辛格.所有的动物都是平等的.江娅译.哲学译丛,1994(5).

根据是成为“生命主体”。他说：

成为生命主体不仅意味着是有生命的和有意识的……它还意味着拥有期望和愿望，拥有感觉、记忆和未来（包括自己的未来）意识；拥有一种伴随着愉快和痛苦感觉的情感生活；拥有偏好和福利；拥有发动行为以实现自己的愿望和目标的能力；拥有一种历时性的心理上的同一性；拥有一种独立于他人的功用性的个体幸福状态。那些满足生命主体标准的存在物具有一种特别的价值——天赋价值——不能被仅仅当做工具来看待或对待。^[1]

雷根认为，某些动物，至少哺乳动物，符合成为生命主体的条件，因而具有固有价值，也同样具有天赋价值。动物的天赋价值的存在决定了人类不能再将它们当做实现某些目的的工具或手段，而应当像尊重人的天赋价值一样尊重动物的天赋价值，尊重它们基于天赋价值的道德权利。

以辛格和雷根为代表的动物福利论肯定了自然界广大动物的内在价值，但真正在跨越道德界线的道路上前进了一大步的是“生命中心主义”(biocentrism)。首先倡导生命中心主义理论的是史怀泽。他在其代表作《敬畏生命》一书中阐发的伦理思想可用他的一句话来概括：“一个人在下述情况下是道德的，当他遵守义务去帮助所有他可以帮助的生命，而害怕伤害任何生命时……生命对他来说是神圣的。他不撕扯树叶，也不采摘花朵，并且小心不压死昆虫。”^[2]

将史怀泽的“敬畏思想”发展成“尊重自然伦理学”的是美国

[1] Tom Regan, *The Case for Animal Right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p. 43.

[2] Albert Schweitzer, *Out of My Life and Thought*, New York: Holt, p. 28.

学者泰勒。泰勒把“尊重自然”作为其理论的最高原则。他说：“拥有尊重自然的意念即是认为地球自然生态系的野生动物具有固有价值。此类生物具有固定价值可以看做是尊重意念的基本价值预设。”^[1]泰勒首先区分了两个不同的概念：存在物“自身的好”(good of its own)和存在物的“固有价值”(inherent value)，然后，他提出了“生命中心论自然观”的“信念体系”。该信念体系由4点组成：(1)人类与其他生物一样，是地球生命共同体的一个成员；(2)人类和其他物种一起构成了一个相互依赖的体系，每一种生物的生存和福利的损益不仅决定于其环境的物理条件，而且决定于它与其他生物的关系；(3)所有的机体都是生命的目的中心(teleological centers of life)，因此，每一种生物都是以其自己的方式追寻其自身的好的惟一个体；(4)人类并非天生就优于其他生物。泰勒在论述生物中心主义观点的这四方面内容时，重点放在阐述人类是生命共同体的普通成员和反驳人类优等论上。在他看来，人是地球生物圈自然秩序的一个要素，因此人类在自然系统中的地位与其他物种的地位是平等的。在谈到如何处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时，泰勒认为最基本的行为规则有4条：不伤害原则、不干涉原则、忠贞原则和补偿正义的原则。所谓不伤害原则就是不要杀害个体、不要破坏种群和生命共同体；不干涉原则要求人们对整个生态系统采取一种整体上的“自由放任政策”；忠贞原则指人类对野生动物的行为，要求人们“不要打破一个野生动物对我们的信任，不要欺骗和误导它们，而要去支持它们的期望”^[2]；补偿正义的原则要求当道德顾客(moral patient)被道德代理人损害时，道德代理人有义务恢复正义的平衡。泰勒在《尊重自然》一书的最

[1] Paul W. Taylor, *Respect for Nature: A Theory of Environmental Ethics*,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80.

[2] Paul W. Taylor, *Respect for Nature: A Theory of Environmental Ethics*,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6, p175.